



中国十外交家

主编 石源华 副主编 戴鞍钢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胡小静
封面装帧 王建纲

中国十外交家

石源华 主 编

戴鞍钢 副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 插页 8 字数 348,000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8—02875—3/K·692

定价 26.00 元

目 录

前言	石源华(1)
郭嵩焘	杨小川(1)
初染西风——大沽之役——潜修洋务——涉足外交——“循理”思想——出使风波——英伦两载——觐国取经——郭刘内斗——悲凉晚秋	
李鸿章	戴鞍钢(34)
涉足外交——“外须和戎”——保护华工——对日外交——“以夷制夷”——中法议和——马关遇刺——首访欧美——辛丑风云——抱憾辞世	
曾纪泽	戴冕(67)
名门之后——出使英法——风波乍起——迎难而上——虎口夺食——中法交涉——寂寞晚年	
黄遵宪	陈潮(86)
青少年时代——从探索洋务到出使日本——琉球交涉的强硬派——“主持朝鲜外交议”——出任驻旧金山总领事——追随薛福成使英——新加坡护侨——断结五省未结教案——参与苏州开埠谈判——在维新变法的激流中——壮志难酬的晚年	
陆徵祥	石建国(131)
形影相对父与子——步入外交殿堂的大门——通向红地毯的时刻——圣彼得堡寒冷的春日——第一个剪辮的清廷公使	

——首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难以释怀的外蒙交涉——抹不去的污点——波三折的巴黎之行——遁入空门——身受哀荣

顾惠庆..... 陈 雁(186)

基督徒家庭——从留学生到洋进士——初涉外交舞台——出使欧洲——执掌外交——在政治漩涡中沉浮——再度涉足外交——出使苏联——退休生活

顾维钧..... 钱玉莉(233)

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从总统秘书到驻美公使——巴黎和会一鸣惊人——周旋于军阀纷争之中——置生死于度外——斡旋越南过境运输——协调战时中英关系——参与筹建联合国——勉为其难的“外交”重负——国际法官十年——难圆还乡之梦

王正廷..... 王 践(293)

负笈求学——跻身政坛——载誉和会——督办鲁案——对苏谈判——“关会”首席——“两案”交涉——改订新约——替罪羔羊——驻节华府——多面人生

陈友仁..... 周燕芳(336)

太平军的后裔——特立尼达的中国律师——归国服务——孙中山的挚友——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时代”——莫斯科之行——参与反蒋运动——投身抗日事业——魂系国土

宋子文..... 孙 锐(367)

特殊的家庭与家教——主持革命财政——“蒋介石的钱包”——拒日派领袖——欧美之行——辞职风波——西安救蒋——为抗日救国而奔走——赴美求援——战时外交部长——主持莫斯科会谈——行政院长任内——赴粤主政——亡命美国

附录：近代中国外交机关历任行政首长小传

..... 陈莉菲 石建国(415)

郭嵩焘

杨小川

1876年12月3日(光绪二年十月十八日),一位头顶花翎、留着长辫、胸挂朝珠、年近六旬的清朝大官僚受命率领他的一班人马,从上海启程驶向英国。这位大官僚就是郭嵩焘。他是中国首任驻外公使。

虽然,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75年的35年间,那些跨出国门的中国人,仔细算起来也有几个,如林鍼、罗森、斌椿、志刚、容闳、王韬和李圭等,但是他们只能算作是中国派遣驻外使节的前奏或序曲,真正的主题歌应该从郭嵩焘开始。

初染西风

1818年4月11日(嘉庆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郭嵩焘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一个地主家庭。乳名龄儿,学名先杞,后改名嵩焘,字伯琛,号筠仙,也写作云仙或筠轩、仁先,晚号玉池老人。因为他的书斋自名为“养知书屋”,所以他又被人称为养知先生。

郭嵩焘的曾祖、祖父、父亲都是读书人,但三代人都没有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爬上去,最多只得到过贡生(曾祖)、秀才(祖父)的功名。据郭嵩焘回忆,他的父亲、伯父、叔父与朋友“以诗唱

和,或一日数作,或竟日不一作。暇或出游,提诗以归,已而尽弃去,不自收拾”,这种文人学士的洒脱飘逸,与“红袖添香夜读书”的青灯寒窗相比,颇有几分与正统不大协调的味道!这也许就是他们不能成名的主要原因吧?郭嵩焘自己也是“少习辞章之学,泊壮治经史,不能专”,似乎正是继承了乃父家风。

青年郭嵩焘,也和其他人一样好功名,不久中进士、点探花、授编修,在科举之途上一步一步向上挤。

1835年,18岁的郭嵩焘考中秀才,与弟弟同补博士弟子员。第二年,他开始在湖南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与曾国藩、刘蓉结为至交。这年曾国藩26岁,刘蓉21岁,郭嵩焘19岁。他们踔厉风发,“均志大气盛,自视颇高,以著述立言相期许”,“其志终不在温饱”,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所不同的是,曾、刘主攻程、朱理学,以封建卫道士自任,步向儒家神殿正堂,而郭则“精研词章”,时时语惊封建庙堂,带有更多的离经叛道的文人反对派的气质。后来曾国藩精当地评说郭嵩焘“芬芳悱恻,屈(原)贾(生)之流”,“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认为他只能著书立说,不能担任匡扶社稷的“繁剧”工作,大概就是闻到了郭嵩焘身上的异端气味。

1852年,太平军出广西,过湖南。这场暴风骤雨,成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大批湖南在野士人登上政治舞台的契机。湖南这方土地,一变历史上长期沉寂,“少人多石”的状态,出现了“楚境一隅,经营天下”的局面。郭嵩焘在他写的《湘中竹枝词》中,赞颂这种在他看来是令人感奋的局面:

捶鼓家家起荷戈,大风吹蹙洞庭波。

由来楚境横天下,千里潇湘地几多。^①

道、咸之际的湖南,也确实“楚境横天下”,在全国政治思想舞台上占了一个奇特而重要的位置:一方面仍旧以保守、“霸蛮”而

① 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1,第1页。

出名；另一方面，又在各方面都出了不少很大胆、很活跃、能“开风气之先”的人物。这些人物在敌对的环境、尖锐的冲突中冒尖，以一种异己的精神面目和惊世骇俗的言论行动，使得举国上下都为之侧目。甚至可以这么说，正是在这敌对的环境中炼就出了与世格格不入的才人，有如寒星将暗黑的冬夜反衬得更加明亮夺目。

湖南这方水土，“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是中原和江淮文化向岭南和苗僮地区传播的“蛮荒边缘”。近代洋人从广东入侵，湖南又首当其冲。新旧观念在这里互相冲击，新旧思想在这里激烈交锋；新“变局”带来的问题在这里显得格外尖锐，旧制度固有的顽疾在这里表现得格外分明。对于大事小事都十分认真而又容易走极端的“蛮气”，在这里的人们包括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特别强烈。有人说，湖南的民气“坚如铁桶”，“虽可嫌，实可喜”^①。这里讲的是认真坚忍的性格比浮华易迁的性格易于有成，但也或多或少触及到了湖南地方风气的一大特色。郭嵩焘正是在此新旧思想交锋中离经叛道和出类拔萃的“楚材”中的一个！

与曾、刘订交以后，青年郭嵩焘又陆续结识了左宗棠、江忠源、罗泽南诸人。郭嵩焘是和“曾左彭胡”一道登上政治舞台的。他与曾、刘是换帖之交，又与曾、左是儿女亲家，关系不是一般。郭氏的聪明才学，也不在曾、左之下。

在曾、左诸人的所谓“中兴”事业中，郭嵩焘曾出过一些重要的主意，郭嵩焘自称“八载宸军解佩刀”，比如劝左宗棠出山佐张亮基幕，劝曾国藩遵旨出办团练，首倡开厘捐筹军饷，建议练水师保交通等，都具有影响全局的作用。

1856年春，郭嵩焘抵达杭州，初读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第一次听到“日不动而地动”的说法，“颇以为疑”。那时候，对于西方人来说，地动说早已是常识，但对中国人来说，地动说无异于痴

① 黄庆澄：《东游日记》。

人说梦。郭嵩焘并不像一般闭目塞听的儒生，断然否定这种看来荒谬的说法，而是追根问底，向友人详细了解这种说法。

同年3月，郭嵩焘抵达上海。上海在鸦片战争后成为国内最大的对外开放城市，洋人、洋货比较容易见到。这使从内地来的郭嵩焘大开眼界。他在法国洋行看到了风雨表、千里镜（即望远镜）等新式器具，在法国领事馆所见“穷极奢糜，夷房极明爽”，“置诸玩器，精耀夺目”。郭嵩焘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面对“精耀夺目”的西方文明，没有吓得“非礼勿视”，而是实事求是地承认它，并逐步形成自己走向世界的胸襟。

郭嵩焘的这种心态和那个时代大多数士大夫的心理是格格不入的。饶有趣味的是：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尘封了几千年的大门被英国撞开。今天的中国人也许都毫不怀疑南京条约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是一个不公正的条约。可是，当时清政府和中国大多数士大夫却认为，西方国家仍是朝贡国，南京条约只是皇帝给英国的“恩惠”。清政府未曾思考对外政策的改变，从政府到士大夫，仍然一如既往地以冷漠和麻木对待外来的一切。

可见，物形的封闭可以被炮火打破，而精神的封闭却并不能被轻易打开。一个拥有自己成熟文明传统的民族，在重新接受一种外来的带有强制性的新文明时，是非常困难的。这时的中国士大夫中，依然被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包围着。郭嵩焘能正视西方文明，这在当时的确需要有一定的勇气！

1856年3月18日，郭嵩焘参观了英国兵船。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极其详细地记载了军舰的外形、结构、武器装备，连舰前轮叶的周长为13尺、1分钟转64轮、水箱贮水300余石、蒸汽机的阀门进退这些细节都充分注意到了，并仔细记录下来。郭对洋人的饮食习惯也作了侧面考察，发出“西人举动，务为巧妙”的感叹。对于“夷人所住，靡不清洁”，他也叹为观止。同天，他又参观了外国人

开办的编译局——墨海书馆，在那里，他得到了伟烈亚力所撰的数学书一部、英国教士在香港出版时事月刊《遐迩贯珍》数部。这些书把郭嵩焘的视线进一步引向西方。

第二天，郭嵩焘在街上遇到了法国洋行的几个外国人，他们也认出了这个来参观过的中国人。也许那时愿主动接触“洋鬼子”的人很少吧，这几个洋人很高兴地与郭握手致意。这本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郭嵩焘在当天的日记中却记录之并加评论：“一面之识而致礼如此，是又内地所不如也。”看来西方的一切都使他极感兴趣，他不时流露出推崇之情。

上海之行，郭嵩焘还接触到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曾国藩也读过这本书。但曾认为徐书的记载为英人大张其词，“英夷”怎么会像徐所描绘的那样神乎其神呢？郭的态度却与曾不同，“亦震詫之”。不过，他之所以震詫就是因为他知道了在中国文明之外还有一种前所未闻的西方文明。尽管对这个文明还缺乏深刻的了解，但上海之行却为郭嵩焘补充了不少感性认识，西方比中国先进的初步印象已经形成。从此，他的思想和注意力就完全为这个“精耀夺目”的西方文明所吸引，向往它，追求它，并力图把它移植到中国本土来。

大沽之役

1858年当英法舰队迫近大沽时，北京的许多官员主战，而郭嵩焘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夷务“不战易了，一战便不能了”。

在回答僧格林沁关于是先打豫东的捻军还是先打天津附近的西洋人的问题时，郭嵩焘说，因为捻军已形成严重的“叛乱”，应予讨伐；而西方人只想做生意，故以和为贵，不宜诉诸战争。1859年，当僧格林沁准备同英法联军作战时，郭嵩焘17次给他写信，反对这种行动。

这年6月,僧格林沁领导的大沽之役取得了空前辉煌的胜利,消息传到北京,一片欢腾。郭嵩焘因参与大沽之役有功,赏花翎,各种溢美之辞扑面而来。此时,郭嵩焘却异常冷静,对这次“不幸”发生的大沽之役颇不以为然。战后他曾致信给曾国藩:“天津之役,人皆分美及鄙人,而独引以为忧”。

早在郭嵩焘24岁时,他已在浙江省东部亲眼目睹鸦片战争。战后不久他经过反省后认识到,“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置失宜”。郭嵩焘主张根据力量对比,审度利害得失,来确定战争与和平这个重大的问题。这时候,清政府遇到的是空前强大的对手:在政治上以封建专制对资本主义体制,经济上以小农经济结构对大机器生产,军事上以旧式冷兵器对新式热兵器,形势十分严峻。正是基于对以上形势的认识,他对大沽之役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镇压太平军是当务之急,对付洋人则可从长计议。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以天下大势论之,海口用兵与否,终究无定局”。这就形成他以后对外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与强大的西方各国交往时,只能忍辱负重,力求和局,慎言战事。

郭嵩焘对清廷内不负责任的清流派的主战论深恶痛绝,批评他们“不揣彼之情,不度己之势,持一恢复中原之公义,贸贸然以兵为戏而姑试之。南京以来,盈朝塞野谈战伐者,大率清之流也”^①。他还深挖清流派积习的原因:“宋明史册具在,世人心思耳目为数百年虚骄之议论所夺,不一考求其事实耳”。他指出:不负责任的主战论曾经十分盛行于南宋时期(1127—1279年),当时南宋的军事力量不如北方游牧民族,面临着自己的文明被毁灭的可能性。于是,汉代的军事现实主义和唐朝的世界主义精神让位给了保守的主战精神。这个传统在19世纪下半叶再度抬头。清流派鼓吹同俄国、法国或日本作战,这种态度使人联想起南宋时期这类人物

① 《郭嵩焘日记》(一),第417页。

“空洞的主战论”，他们只会挥动笔杆子，而毫无实战知识。

清流派的主战精神部分地是出于对 1840 年、1860 年几次战争的愤怒，部分地是出于一些年轻的、咬文嚼字而又没有经验的官员片面地强调中国的道德力量。清流派的爱国是以顽固、愚昧和排外为代价的。他们坚决主张“宁可覆国亡家，不可言和”。郭嵩焘对于清流派的批评有其合理的成份，但也反映了他对于西方列强力量的过高估计，这些认识对于日后其对外交涉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潜修洋务

郭嵩焘是晚清洋务派的重要人物。早在 1847 年秋，郭嵩焘中了进士以后到南京一带游览，曾谒见两江总督李星沅，以长诗奉赠，中有“转念疆场警，须崇颇牧褒。岛夷虽弭伏，舶市尚喧嚣”。诗中说的是，鸦片战争已成为过去，东海听不到洋人的枪炮声，中国又恢复了战前的沉寂，社会在无声地腐烂。很多达官贵人早已把城下之盟的惨痛忘到九霄云外，郭嵩焘却时时以“夷务”为忧。虽然他受时代限制，一时不能真正了解“岛夷”，对他们仍然有蔑视之情，但他却从和平的宁静中敏锐地听到了西方商品东来的“喧嚣”之声。在这喧嚣之后，他更隐隐地感到一种潜在的危机，使他时刻不能忘记。从此，他的视线转向世界，与“夷务”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

在 1863 年 10 月任粤抚之前，郭嵩焘已以懂洋务知名，但他并没有亲自处理过重大的实际问题。广东巡抚与洋人打交道的事很多，他一上任，英、法领事先后登门拜会，他也回拜了法国领事李添嘉及翻译巴世栋。他积极接触洋人，不避“夷夏之防”，与英国领事罗伯逊建立了相当密切的私人关系。从与洋人的交往中，他尽量了解西方的经济、军事、政治及其他方面的情况，以期从中寻觅自强之路。他感到西方国力的强盛在于工商业发达，很想在他职权

范围内作些努力。

1866年郭嵩焘草拟了一份奏折“畅论中外交涉事宜”，因为要去职没有上报，但他在寄给总理衙门的信中建议解除“海禁”，设立市舶司，“专管出海商船，听从商人制造火轮船”，对于商办轮船制造业应与官办企业一视同仁。并曾与罗伯逊商讨，相约“设立船厂，派一广东绅士主之”。他强调商办企业能与洋人争胜分利，而其他洋务派所创官办企业则弊端重重，于国于民都不利。这种重商求实的思想使郭嵩焘在洋务派中独树一帜。

郭嵩焘所办另一重要洋务为开办广州同文馆。1859年郭嵩焘就曾向咸丰帝建议开办学校，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培养翻译，推进洋务。郭嵩焘是中国近代第一位倡办同文馆的人。但这个建议未被立即采纳，直到1862年7月中国第一所同文馆才正式在北京建立。郭氏担任广东巡抚的第二年，创办了广州同文馆，使中国又多了一个与西方交流的窗口。由于他的思想开明和礼贤下士，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博学多才的洋务专家，如李善兰、邹伯奇等。郭积极地把他们推荐给朝廷。李善兰后被调入北京同文馆任算学总教习，在那里执教13年，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

对于搞洋务，郭嵩焘显得非常自负。他认为，中国“办理洋务三十年，全无知晓”，只有李鸿章“能见其大”，丁日昌“能致其精”，沈葆楨“能尽其实”，“其余在位诸公竟无知者”^①。有人曾评价郭嵩焘经营洋务“既精且大”，郭氏答道：“岂唯不敢望精且大，生平学问皆在虚处，无致实之动，其距幼丹（沈葆楨）尚远”^②。

涉足外交

就对外交涉而言，郭嵩焘早在出使英伦以前，已经处理过好几

①② 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1，第544页。

件事件了。

当黄宗汉为两广总督时，黄曾劝派捐输，令怡和洋行的行商伍崇曜负责筹银 32 万两。伍氏向美国旗昌行 (Russell and Co.) 借贷，约明 6 厘行息，半年为期，由海关关税内拨抵，并由海关给予印票为凭。后来美国领事代旗昌行向清政府追讨。清政府认为既然是捐输，则应当由广东的富商们共同捐献归还。郭嵩焘到广东任职后不久，伍崇曜病歿。清政府恐怕海关原票落到美国人手中，会引起麻烦，令郭嵩焘设法归还该项银两。郭氏接到谕旨后，认为此事不宜宣扬。因为一旦清政府害怕海关印票落入洋人手中的消息走漏，反而会使洋人有了口实，会激起他们对华的要挟和恫吓。不如直接严词拒绝美国领事，一面令伍家后人从速清理。如果伍家果属力难全偿，那么届时再由政府帮助料理。清政府采纳了郭氏的意见，收回了海关印票，消去了一场涉外纷争。这是郭嵩焘初到广东所遇到的一件间接与洋人打交道的的事情。

1863 年 10 月 6 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与荷兰使臣礬大何文 (J. des Amerie van der Hoeven) 在天津订立商约。1864 年 10 月，清政府命郭氏与荷兰使臣在广州换约。但郭临时发现荷使所持的条约并非原约，与互换之义不符，于是让荷使取回原本，另行订期办理。直到 1865 年 7 月 26 日，双方才在广州换约。事后，礬大何文对郭说，换约一事，本来应当取原本互换，西洋各国互换条约都是这样的，但是中国从前换约十几次，从未取回原约，所以我也照办。由此可见郭嵩焘办事细致的作风。

广东潮州原定于 1858 年开埠，但没有实现。两年以后，英国驻汕头领事想到潮州府城会晤惠潮道，结果被当地绅民阻止。英国驻京公使向总署抗议，清政府命广东督抚按照条约行事。广东当局害怕这样会激起民怨民变，所以一直拖着不予办理。英国公使多次催询，到了 1865 年，总署再次叮嘱郭嵩焘办理此事。在郭嵩焘看来，潮州绅民所以不让英国人入城，一定有其原因。于是先

命惠潮嘉道张铨向该处绅民探询,得知:潮州绅民害怕英领事入城之后,接着而来的是开张行店、设立关卡、建造天主教堂等,所以坚决拒绝。郭嵩焘把这些告诉了英领事后,英领事声明潮州人民所疑虑各点,英国人一定不会去做。于是张铨约集绅耆开导,但距离入城的时间还有两天,潮州人民偏偏又大张揭帖反对。英领事入城后,拜访府县,均拒而不见;商民也纷纷罢市。英领事狼狈出城,沿途又被当地百姓肆骂,抛掷砖块石块。英领事大怒,认为这是张铨故意设计侮辱,即向广东督抚抗议。接着,北京方面也下诏命郭嵩焘、瑞麟等查办。次年正月,总署又得到英国公使阿礼国(R. Alcock)的照会,措词异常激烈,认为英领事不能进潮州城,和1856年广州人不准英国人进城一事一样严重。这必将使得各国视中国政府无力饬谕各省官民遵守条约,“实有危险之处”。郭嵩焘命人尽约潮州绅士到广州,每人发一本通商条约,请他们仔细阅读,对他们说:凡是通商条约上所载明的,也就是朝廷谕旨所允许的,如果抗违,那就是违旨。凡是条约上没有载明的,我方当然可以以理拒绝。从前叶名琛坚决拒绝洋人入城,结果省城失陷,身为夷虏。英人既然可以攻省城,难道不可以攻潮州城吗?潮州诸绅士聆训后,唯唯而退,不再有所异议。1866年7月8日,汕头英领事入潮州城。这件涉外悬案,终因郭嵩焘以与外国所订条约为依据而得以解决。

香山县监生林胜汉曾以报效军需为名,申请开采海南岛昌化县黎峒山铜矿。以10年为期,每年缴银2千元。清政府允许他试办6个月,先输捐1万。1866年初,林胜汉率领英国人10多人,乘轮船前往昌化。郭嵩焘闻报后,认为事态严重,就写信给英国领事罗伯逊,告诉他向来黎峒开采铜矿,均一律雇用本地人,从来没有招工开采之事,也没有包开10年之事,请他制止英人。后来罗伯逊回信说,按照和约,英商船只可以在准开通商各口贸易,如果到别处沿海地方私作买卖,即将船、货一并没收入官,可请中国方面

遵照办理。这是郭嵩焘和外人交涉保护本国地矿权而获得成功的一例。

1874年10月中日《台湾事件专约》签字,日军退出台湾,中国赔款50万两。台湾事件和平解决。沈葆楨以台湾距内地太远,拟设电报以为联络,建议由丹麦大北公司承办。工程还未及一半,俄国也藉例要求在中国设电报线,清政府乃命收回由中国自办。福建方面委托通商总局提调丁嘉玮任其事。丁氏与丹麦订约,大意是公司所设电线的物料,全部由中国买回,其他未成部分仍由公司限期动工,公司方面应教会中国人学习电线技艺,另外由中国方面付银15.4万余元。合同订立后,总署认为丁嘉玮办理不当,要求重新订立。但是双方已签了字,势难中废。这时郭嵩焘为福建按察使,福建总督李鹤年认为郭氏“明体达用,洞澈洋情”^①,请郭氏再与丹麦人交涉。经过郭的据理力争,终于达成协议:福厦电线仍由大北公司承办,完工后由中国验收管理,马尾的电线价由7000余元改为4000余元,教培电线工人的报酬为9万元。这是郭嵩焘与外人交涉挽回利权而成功的又一事例。

大体上说来,郭嵩焘在出国以前经手办理的涉外事务为他以后担任驻外公使积累了处理外交问题的丰富经验。

“循理”思想

郭嵩焘在外交方面有一整套思想。他认为国力乃外交之本。因此, he 有三种方案:

第一是“力求富强之术”。郭嵩焘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力求富强之术,殚思竭虑,与之驰骋。行之一日,而可收效数年数十年

^① 《海防档·电线上》,台湾1957年印。

之后,当事者不乐为也”^①。那么,郭氏的“富强之术”是什么呢?他似乎有变更政教的意思:“一曰求制胜之术,其大本大原处,不敢遽言也,稍清理其节目,以求所以自立,涂饰一时耳目,固亦有乘机立断之方,有循序渐进之略。期之三年、五年,以达数十年之久,吾曹心力犹及为之。然非有力求振兴之资,震荡昭苏,扩充积累,终亦无济”^②。所谓“不敢遽言”者,似指变更政教也,这从郭氏文集中可以看出。郭嵩焘主张,西方政教中也有中国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第二是“整顿现状”。郭氏以为,“其次则用今之法,行今之政,苟取循分自尽而已。则亦必求知所以循分自尽者为何事,而行之何先?如今日吏治之督乱,欲无整饬得乎?民生之凋弊,欲无存卹得乎?吏事固必求理矣,民气固必求通矣,朝廷持是以课之疆吏,疆吏持是以课之有司,钦钦焉求所以治国而理民,悉洋务一切废罢不讲,而洋务自理”^③。也就是说,“一切政教风俗皆不敢言变更而苟幸一日之无事”^④。他认为这一方面的注意点有三个:“分别功过以为用人之程,讨论得失以为制事之准,熟览中外情势以为应付之方”^⑤。能做到这三点才可说是“了事”。

第三是讲求外交上的应付之术,用郭嵩焘自己的话来说为“敷衍”。什么叫做“敷衍”呢?那就是“审事以处之,度情以应之,使无求逞而已,非待召衅启侮,陵蹠要挟,而后与言敷衍也”^⑥。在这里,他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循理”。他说:“其下则并此不能为,吏治之媮敝如故也。民气之壅塞如故也。而彼眈眈环视之洋人,亦必求所以应之。应之维何?曰理而已矣。审吾所据之理,必有道以通之。审彼所据之理,必有辞以折之。务使理足于己,而后感之以诚,守之以信,明之以公。竭一人之力,控制指麾而无不如意,

① ③⑤ 《养知书屋文集》卷11,第17页。

② ④⑥ 《养知书屋文集》卷11,第11页。

则亦可以求数十百年之安”^①。

“循理”是郭嵩焘外交核心思想。这个思想在郭嵩焘的心中很早就形成。1859年僧格林沁因英法舰队北上换约要想邀击时，郭嵩焘就曾向僧王上了17次说帖加以反对，其大意是：“苟欲击之，必先自循理。循理而胜，保无后患；循理而败，亦不致有悔”^②。后来郭嵩焘从翰林院弃职而归后，途中写信给曾国藩，报告英法联军之事，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夷祸日深，小臣数年所持，不幸而其言渐验”，“凡吾所言，非示弱也，道也。以道御之，以言折之，而固可不战也。其终战焉而胜与负两无悔也”^③。郭嵩焘向曾国藩解释上僧王说帖中的衷曲。后来他又把这个意思告诉友人方子听：“西夷本末，粤人多能知之，以其久习而知其情伪耳。仆则衡之以理，审之以天下之大势，而其情亦莫能遁焉。”^④他还告之尚书沈兆霖：“天下事一理而已。理得而后揣之以情，揆之以势，乃以平天下之险阻而无难。”^⑤

马嘉理案发后，总署与威妥玛交涉时，郭在京师有书与沈葆楨，自称于洋务粗有所见：“窃以为控御之方，在去猜嫌之见，而以礼自守，以制其嚣张之气。求因应之宜，而力争先着，以杜其要挟之心。传曰：凡事豫则立。而与外人相接，理不壮即气不充。京师士大夫务为虚骄，横生议论，不一考求事理，视二十年前之见解，无以易也。”^⑥后来，郭氏针对此案，又拟上疏清廷，以为办理洋务：“不越理势二者。势者，人与我共之者也。有彼所必争之势，有所必争之势，权其轻重，时其缓急，先使事理了然于心。彼之所必

① 《养知书屋文集》卷11，第17页。

② 《玉池老人自叙》，第8页。

③ 《陶风庐藏名贤手札》第5册，郭与曾第三封信。

④ 《养知书屋文集》卷9，第8页。

⑤ 《养知书屋文集》卷9，第11页。

⑥ 《花随主人圣庵摭忆》，第159页。